

黄遵宪儿童诗歌中的教育观嬗变研究

黄娇娇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省南昌市, 330013; 2112064766@qq.com)

摘要: 黄遵宪(1848—1905), 字公度, 广东嘉应人。晚清大臣、外交家、爱国诗人。他主张“我手写我口”, 其诗歌突破传统束缚, 以轮船、火车、电报等新意境、新事物入诗, 语言通俗而富有变革精神。在儿童诗歌领域, 他创作的《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作品开近代儿童诗之先河, 语言清新活泼, 内容贴近儿童生活, 强调快乐学习与爱国启蒙, 深刻影响了后世儿童文学的观念与创作。

关键词: 空间迁移; 黄遵宪; 儿童诗歌; 教育观重构

引言

1877至1894年间, 黄遵宪先后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 海外外交生涯使其成为在跨文化实践中重构教育观的典范。他创作的儿童诗歌(如《日本杂事诗》教育篇目、《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 呈现了其启蒙理念在空间迁移中的演进轨迹。创作期恰逢甲午战争前夕, 彼时中国教育深陷传统科举制度僵化与新式教育萌芽的胶着状态, 呈现出明显的“新旧并存”局面, 既有传统体系的延续, 也有洋务运动推动下的局部革新, 但整体仍受制于封建体制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束缚。因此, 仅依托国内背景审视其教育观难免偏狭。这一阶段的儿童诗歌创作, 不仅是黄遵宪教育思想的实践性文本, 还是其在异质文化场域中检验、探索并重构教育理念的途径。

现有黄遵宪诗歌研究多集中于《人境庐诗草》整体或其政治诗, 对其外交时期创作的儿童诗歌及蕴含的儿童教育观关注鲜少。虽有学者论及其教育思想, 但将其与海外空间经验进行关联性的考察几近空白。研究首次系统探讨海外空间迁移与黄遵宪儿童诗歌创作及其教育观嬗变的深层关联。具体而言: 一方面, 剖析了地理空间的转换对其儿童诗歌形式特征与主题内容的塑造作用; 另一方面, 考察了其日、美、英、新四国外交生涯中, 所接触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对其教育观念的重构过程; 最后, 揭示了其儿童诗歌如何作为独特的启蒙教育空间, 呈现其变革性理念。

1. 地理空间烙印下的文本重构

异域文化交错的空间呈现出特定的历史面貌, 它只是提供了文化融合客观上的可能性, 而在如何弥合本土与异域之间空间想象的冲突时, 主体空间展现出更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1]。地理空间的位移不仅是黄遵宪教育思想的转折点, 更是其儿童诗歌文本形态的直接塑造者。研究从形式与内容双重维度, 揭示文化场域如何催生诗歌文本嬗变。

1.1. 形式嬗变

1.1.1. 从古典雅言到启蒙白话

黄遵宪同治十二年中举, 作为科举体系培育的精英, 他对近体诗平仄、对仗、押韵的掌握已成本能。其早期儿童诗如《日本杂事诗》, 仍采用七言绝句体, 如“化书奇器问新编, 航海遥寻鬼谷贤”, 体现传统诗学训练对形式的深层规训。诗歌形式的革新是黄遵宪儿童教育观转型的语言载体, 其嬗变轨迹与空间迁移深度绑定, 如表1所示。

表1 黄遵宪儿童诗歌形式演进

空间阶段	代表诗歌	形式特征	地理影响机制
日本时期 (1877-1882)	《日本杂事诗》	改良式传统体：1.沿用竹枝词七绝体式2.注入新词汇（体操、学堂）3.保留典雅韵律（例：“捧书长跪藉红氍”）	近距离观察的调和性：1.明治教育场景（体操课、集体朗读）需新词汇承载；2.汉字文化圈的同源性使诗人选择“旧瓶装新酒”，平衡启蒙诉求与文化惯性
英美时期 (1882-1894)	《幼稚园上学歌》（1890，伦敦）	革命性白话体：1.三言杂言自由句式（例：“春风来，花满枝”）2.口语化表达（“阿爷”“阿娘”）3.复沓节奏（“听！听！听！”）4.拟声词运用（“丁丁当”）	跨文化距离的解放性：1.远离汉字文化圈弱化“雅言”权威；2.英语儿歌的韵律启发（如《鹅妈妈童谣》）；3.伦敦多元语言场域催生“语言工具论”认知——白话是启蒙童蒙的空间适配性策略

黄遵宪儿童诗歌形式的演进，深刻映射了其空间迁移的地理轨迹。从东京到伦敦，物理距离的拉远伴随着文化同源性的显著递减：东京尚存汉字文化圈的亲缘性束缚，而伦敦则代表着全然异质的西方文明。这种精神场域的疏离感，反而成为其挣脱传统诗歌形式枷锁的契机——文化距离越远，来自母体传统的束缚力越弱。诗歌形式因而发生适应性蜕变：严整的汉诗格律逐步让位于句式自由、韵律明快的白话儿歌体。这种形式革新并非单纯的美学选择，实则是黄遵宪在跨文化语境中探索出的空间解决方案：以贴近儿童语言习惯与认知水平的白话儿歌为载体，在其构建的诗歌教育空间中，更有效地传递启蒙理念，实现异质教育思想的本土化落地。地理的迁移，最终催化了形式的解放，而解放的形式精准服务于儿童认知空间的开拓。

1.1.2. 从“新乐府”到“杂歌谣”

为涵纳新风格、新意境且可歌的韵文文体，使其适应教科书编纂之需，黄遵宪提出以“杂歌谣”取代“新乐府”的文体革新 [2]。其杂歌谣创作实践实则发端更早，从汲取客家山歌风格的《山歌》，至后期发表于《新民丛报》《小说月报》的《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出军歌》等作品，清晰地映射出黄遵宪践行言文合一 [3]，启蒙教育普及以及军国民精神塑造的持续探索。

歌谣属于广义的诗，以歌咏的形式强调教化和抒情功能，同时达到真实、自然的审美特征 [4]。黄遵宪提出儿童教育应寓教于乐，他在客家方言基础上做了改良，结合日本和欧美幼学中唱歌、游戏等形式，创作了《幼稚园上学歌》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如《幼稚园上学歌》：“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儿今断乳儿不啼，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上学去，莫迟迟。”“儿口脱娘乳，牙牙教学语。儿眼照娘面，娘又教字母。黑者龙，白者虎，红者羊，黄者鼠。一一图，一一谱，某某某某儿能教。去上学，上学去 [5]。”《小学校学生相和歌》：“来来汝小生，汝看汝面何种族？芒碯五洲几大陆，红苗蜷伏黑蛮辱。虬髯碧眼独横行，虎视眈眈欲逐逐。於戏我小生，全球半黄人，以何保面目？ [6]”

通过方言改良与跨文化借鉴，将歌谣转化为具有现代教育功能的启蒙工具。“儿口脱娘乳，牙牙教学语”等内容以母子日常互动为场景，通过“龙虎羊鼠”的具象化认知符号，实现了歌谣教化与抒情功能——在温馨的亲情叙事中自然嵌入识字教育，践行“寓教于乐”理念。

1.2. 内容嬗变

1.2.1. 本土场域：科举规训对教育变革的滞碍（1877年前）

黄遵宪教育观的初始形态深植于晚清广东的科举文化土壤。其早年教育经历被经义取士制度严密规训，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知识体系的封闭性——嘉应州学宫以《四书》《五经》为核心教材，强调章句训诂而非实践认知，塑造出“天下观即华夏中心”的僵化宇宙观；教育目标的单一化——在“学而优则仕”导向下，教学聚焦八股制艺，如《人境庐诗草》自述“终日咿唔答策问”，压抑科学探索与公民意识培育。尽管同光年间洋务运动推动新式学堂兴起（如福州船政学堂），但直至1877年黄遵宪出使前，这类尝试仍受三重制约：其一是“中体西用”框架的束缚；其二是保守势力抵制；其三是科举核心地位未被触动。这种旧制度对新因子的压制，使本土教育深陷困局而未能突破。

1.2.2. 海外场域：空间经验与黄遵宪教育观的重塑（1877年后）

黄遵宪的海外经历构成了其教育思想演变的关键场域。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以实证与实用为核心的教育空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地理课堂的世界地图、理科教室的显微镜，共同营造了一个基于观察与实践的知识传授环境，直接冲击了其传统经史子集的教育背景。这反映在《日本杂事诗》中，如“剖破混沌天，行人如蚂蚁” [7]描绘地球仪教学颠覆“天圆地方”观念，展现相互连接的现代世界格局；而小学的体操与军事训

练则促使其在诗句“欲争齐楚连横势，要读孙吴未著书”中强调尚武精神，主张教育服务于国家竞争。东京师范学校的“实验-观察”教学法挑战了典籍研读传统。黄遵宪将地图、显微镜、操练等场景转化为诗歌意象，不仅记录日本实践，更通过诗歌表达知识传授与国家实力的关联，使日本成为其思考如何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国民以振兴国家的重要参照。

继而，美国空间呈现的矛盾性深刻重构了黄遵宪对公民教育的理解。旧金山公立学校系统传授公民权利，而同一城市的唐人街却遍布排华标语。这种并置促使他在诗歌中重新思考公民意识。《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中“百人奋臂一人呼，千人鼓舞万人和”强调集体协作与公共参与的群育价值 [6]；面对排华运动对华人尊严的系统性剥夺，《逐客篇》以“岂谓人异类？不如犬与鸡！”直斥种族歧视，隐含对平等教育权利的强烈诉求。排华法案的实施使他清晰认识到教育缺失导致族群权利丧失的逻辑，推动其诗歌创作转向强调培养具有权利意识与批判能力的公民，这一教育观的转变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并非简单西化。

而英国与新加坡的殖民空间则提供了塑造“新民人格”的帝国镜像。伦敦大英博物馆系统性的科技展陈，向黄遵宪展示了西方科学分类的知识组织模式，直接影响其《幼稚园上学歌》的文本构建：“天上星，参叉商；地中水，海又江”将天文地理知识符号化；“狗能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则将生物学原理转化为儿童常识 [5]。在新加坡多民族共存的殖民地环境中，他观察到文化互动的复杂性，诗歌发展出兼容性的情感表达，“儿愿卖饼卖浆，不离本乡”在申明本土文化认同的同时，并不排斥接纳世界知识 [2]。针对英国殖民统治依赖科技与军事优势的现实，黄遵宪的诗歌隐含“国民素质提升是国家实力基础”的教育主张；而新加坡的族群共处经验，则推动其提出适应多民族社会的教育方案——培养既扎根本土文化又具备国际视野的国民，以此应对殖民地的文化张力。

因此，海外场域——日本的实学空间、美国的民主冲突、英新的帝国镜像——共同构成了黄遵宪观察、反思和重构其教育理念的关键空间。这些经验促使他从国家意识启蒙、公民权利诉求、国民素质塑造等多维度，深入思考如何通过新式教育培养适应近代世界竞争、捍卫自身权利。

2. 空间张力下的启蒙范式转型

黄遵宪海外时期的教育观绝非线性移植西方理念，而是在地理空间驱动、文化场域博弈、文本实践创新三重互动中形成的重构体系，其嬗变特质体现为以下辩证统一。

2.1. 空间驱动型重构

地理迁移直接决定了教育观嬗变的阶段性目标转变，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空间场域的教育观嬗变

空间场域	教育目标转型	内容重心嬗变	空间动力机制
本土场域	士绅（科举精英）	经学伦理（四书五经）	宗族祠堂的伦理规训空间
日本场域	国民（国家基石）	实学技能（地理/兵操）	明治学堂的效能示范空间：解构“科举无用论”
美国场域	公民（权利主体）	民主意识（群育/平等）	排华街区的屈辱刺激空间：唤醒尊严教育
英国和新加坡场域	新民（健全人格）	人格全面发展（知识+情感+品格）	帝国殖民的霸权压迫空间+多元族群空间：熔铸兼容性认同

黄遵宪教育观嬗变的本质，在于空间位移持续重置其教育参照系。这种重构呈现双重演进路径：教育目标的共同体转向——从科举制维系培育服务家族的士绅的血缘共同体，转向明治日本倡导的塑造忠诚国家的国民政治共同体，再进阶至美国经验催生的培育具有平等意识的民主公民的权利共同体，最终在英新殖民语境中凝练为培养兼具本土根性与世界视野的新民的文化共同体；教育内容的理性化跃升——知识体系从传统儒家伦理规训的价值灌输，经日本场域实学技能训练转化为工具理性，在美国民主冲突中升维至权利意识启蒙的政治理性，最终抵达统合科学认知、公民精神与文化认同的整全人格教育的主体性重建。每一次的空间迁移，都为其儿童观的嬗变提供了新的动力。

2.2. 文化场域的辩证吸收

黄遵宪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始终贯穿着警惕性扬弃，形成“借鉴-批判-重构”的辩证链条 [8]。在日本场域，他全盘肯定国民教育制度，他在《日本国志》称“学校之法，最善美” [2]，但通过诗歌创作剥离军国主

义元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刻意将“尚武”与“爱国”解绑，如“欲争齐楚连横势”强调战略智慧而非愚忠，最终将国家意识锚定于民智民力，建构“国民”而非“皇民”的教育观。在美国场域，他吸纳公立教育普及理念，《逐客篇》隐含教育平等权诉求，却以《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中“百人奋臂一人呼”的群育意象批判种族等级制，进而提出“有尊严的公民”概念，如《与梁启超书》主张“教华童以合群自强”，使平等诉求从制度批判转向主体建构。这种辩证性的内核在于：空间迁移带来的并非文化替换，而是通过场域压力筛选与本土价值调适，实现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2.3. 诗歌作为教育空间本身

黄遵宪的儿童诗歌通过文本空间建构策略，在晚清实体教育缺失的语境中实现启蒙功能。《幼稚园上学歌》以游戏化场景叙事，如“排排坐，吃果果”模拟课堂；知识图谱蒙太奇，如星、海、狗、鸡等科学意象拼贴与时空压缩意象“伦敦雾-新加坡阳”并置，分别达成快乐启蒙、常识转化与全球化认知，使诗歌成为幼稚园的替代性教育空间；《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则通过“你来唱，我来和”强化协作，“奋臂”“鼓舞”激发身体参与，以培育集体意识的培养，弥补公共教育空间不足。二者共同证明诗歌能主动建构承担教育功能的意义空间。

3. 地理空间与教育观的诗性互构

3.1. 地理迁移触发认知框架重构

段义孚的空间理论指出，当个体从情感依附的地方性场域（如黄遵宪所处的岭南宗族空间）进入陌生的异质空间（如东京现代教育环境），文化差异将导致原有认知框架重构。黄遵宪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机制：其传统教育认知在两种空间实践的冲突中被解构——宗族祠堂内个体诵经模式与师范学校集体体操实践的组织形式对立，科举功名导向与学校能力认证体系的评价标准颠覆。这种位移效应显影于《日本杂事诗》的文本策略：诗句“捧书长跪藉红氍”聚焦学生群像，刻意省略传统私塾“戒尺”等规训符号，表明对集体教育价值的认同。空间位移由此推动黄遵宪确立教育转型的核心命题：空间组织形式的革新是教育效能提升的关键变量，这直接促成其将群育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构。该案例证明，物理空间的切换构成传统教育范式转型的初始动力。

3.2. 异域空间施加压力

公立学校男女同堂的实践打破“女子无才”传统偏见，推动教育对象向性别平等化调整；唐人街童工失学现象揭示民智落后与民族歧视的关联性，强化教育普及紧迫性认知；排华标语的制度性排斥证实权利保障需实力支撑，催生公民尊严教育必要性。这些压力在《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中获得文本回应：“百人奋臂一人呼”的群体协作意象，构成对个体权利剥夺的象征性补偿。场域压力由此直接推动其教育观从国家工具论向公民权利论的根本转向。

3.3. 诗歌作为教育观的转化媒介

黄遵宪在《幼稚园上学歌》中实践了这一机制：将伦敦气候经验转化为“雾”的气象认知符号，实现自然科学知识传授；将新加坡日照特征转化为“阳”的地理标识，完成地域特征认知；将大本钟声转化为拟声词“丁丁当”，服务于听觉辨识训练。该文本通过三重革新实现知识再生产：首先剥离殖民空间的压迫属性（如伦敦的帝国象征），保留纯粹认知要素；其次将自然现象转化为可教学的知识单元；最终重组异域素材服务于本土启蒙需求。这证明诗歌并非被动记录工具，而是主动建构教育知识的转化装置。

4. 从诗歌文本到教育实践的时空辐射

4.1. 教育史维度：制度重构与教材范式革命

黄遵宪的诗歌文本直接推动了近代教育制度与教材范式的双重革新。1904年《癸卯学制》首次设立的“乐歌课”（《奏定学堂章程》明令“初等小学堂需设乐歌课，以谐性情、养德行”，其“歌辞浅显”的白话韵律要求，如“春风来，花满枝”式口语化表达，直接承袭《幼稚园上学歌》的游戏化模式；而“学生同声歌唱”的集体仪式设计，实为日本群育空间实践与黄诗复沓节奏的跨文化融合。在教材层面，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1904）系统性移植黄遵宪的空间启蒙逻辑——将“星、海、狗、鸡”自然意象转化为《天地日月》课的知识；仿照“卖饼卖浆不离本乡”创作《爱乡》课本土叙事；延续“丁丁当”声景教学法设计《击鼓》拟声训练。

4.2. 文学史维度：文体开创与空间书写传统

黄遵宪的儿童诗歌在文学史维度实现了双重范式奠基：其一为现代儿童诗学开创，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指出其《上学歌》“我手写我口”的白话实践预示新诗运动[9]，核心突破在于以“排排坐，吃果果”的儿童本位语言取代传统蒙学诗的伦理训诫，并通过复沓节奏“听！听！听！”与拟声词“丁丁当”建立游戏化诗学，直接启导黎锦晖《麻雀与小孩》等创作；其二为教育空间书写传统确立，梁启超《爱国歌》（1903）承袭其空间诗学三维结构——将“昆仑山脉”符号化为国族象征（地理意象教材化）、以“地球四大古国”定位文明空间，如知识图谱蒙太奇、用“诸君发愿”召唤群体行动，即群育指令仪式化，这被高旭《爱祖国歌》、秋瑾《勉女权歌》延续。

5. 结语

研究首次系统地将黄遵宪儿童诗歌创作及其教育观嬗变置于其海外空间迁移的地理框架中进行考察。这不仅深化了对黄遵宪个体思想历程的理解，更从方法论上为文学地理学，特别是教育思想史与文学空间的互动研究，提供了基于地理轨迹分析的实践案例。它启示我们，晚清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探索，其空间维度，尤其是异域空间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变量。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其他具有跨文化流动经历的近代知识分子，或深入探讨黄遵宪诗歌所构建的“启蒙教育空间”如何具体影响晚清民初实体教育空间的塑造，以更全面地绘制中国教育现代转型的“文学地理图谱”。

基金项目

江西省2024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五育融合’，打造宜春体验式研学基地”（YC2024-S444）

参考文献

- [1] 梅新林, 葛永海. 文学地理学原理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17.
- [2] 陈铮. 黄遵宪全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3] 王春翔, 刘慧. 黄遵宪“杂歌谣”观念及创作辨正 [J]. 中国诗歌研究, 2024(2): 263-272.
- [4] 曾大兴. 文学地理学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60-365.
- [5] 黄遵宪. 幼稚园上学歌 [J]. 新小说, 1902, 1 (3).
- [6] 黄遵宪. 小学校学生相和歌 [J]. 饮冰室诗话, 1903 (40, 41 号合刊).
- [7]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 [M]// 钱仲联. 人境庐诗草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8] 苏全有. 反对泥古与崇古并存——论黄遵宪中西文化观的双重性 [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2(5): 90-94. DOI: 10.15926/j.cnki.hkdk.2024.05.012.
- [9] 朱蓉, 崔昕平. 论黄遵宪对晚清儿童诗歌的现代性开拓 [J].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3(5): 69-74.